

经验分享

创新是引领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

——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创新形式开展急救培训的做法

■ 江中发

党的十八大以来,“创新”一词频频出现。不论是科技创新、制度创新,还是人才领域的创新,坚持创新、推动创新的理念不断延展。创新是第一动力,没有创新,经济发展、科学技术、社会事业各个领域都很难有新的突破。习近平总书记早已就创新发展给我们指明方向,“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,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,常抓不懈”。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要取得健康长远发展,同样离不开创新。

近年来,四川省成都市各级红十字会在人员少、经费缺、资源不足的情况下,以服务群众、服务城市发展为出发点,不断引进新技术,汲取新观念,在急救培训、志愿者参与社区发展和城市文明建设等领域有所建树,就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,不断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,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而取得的。

机制创新

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,其行动必须“接地气”,在理念、机制、措施、服务上贴近群众,适应群众需要。但事实上,一些地方红十字会是按照行政模式运行,自上而下、群众被动接受,而不是按照群众需求提供服务,群众认可度不高、参与度不强。因此,创新首先从群众需求出发,改变工作运行机制,变群众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,增强群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。

市红十字会培训模式的创新。2015年,成都市红十字会主动适应新发展、新方式、新渠道,增效能,先后在主城区开设多个培训点,设立六类课堂(掌上急救、师资培养、市民预约、急救移动、院校选修、行业定制),经过长期运行,由原来的群众被动参与转化为群众主动参训,

扭转了培训“纳新难”的局面,取得了良好成效。

成华区红会“基地”化运作模式。成华区红十字会借助区群体枢纽工程的实施契机,及时跟进打造红十字培训基地建设,共享群团资源,通过“群英荟”引入社会资源参与,共同构建“基地+街道+社区”三级基层组织体系,推进“1+1+1”计划(一个家庭一个救护员、一个社区一支志愿服务队、一个街道一套急救管理机制)的实施,助力急救培训、志愿服务和社区发展有效结合。目前,该基地已成为省级培训示范基地、成都市干部培训现场教学基地,品牌效果得到彰显。

方法创新

红十字会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,要与时代发展和新技术应用相适应,整合各方力量,借势而上,服务群众。

线上网课+线下实操培训创新。网络化教学是发展趋势,可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学习急救理论,压缩培训时间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市红十字会抓住机遇,快速引入社会资源构建网络化教学平台,让参训者在家就可利用通过网络教学掌握相关知识并参与考试,让市民参与救护培训更加便捷。

龙泉驿区“社区教育+急救培训”创新。龙泉驿区红十字会与社区教育中心进行战略合作,将红十字会优秀师资和精品课程与社区教育平台有效合作,通过区、街道(乡镇)、社区(村)三级社区教育平台面向群众开放,自主报名、自主选修,社区组织、红色教育,将急救培训向继续教育工程发展,深受群众喜爱。

拓展专业救援队技能培训。适应国家应急救援体制改革,充分发挥红十字救援队的技能特长,服务国家专业救援队训练建设和队伍建设。2019年,对四川森林消防总队进行山城、水域等多项综合技能

训练,赢得了良好声誉。

宣传创新

志愿者和爱心人士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,如何让他们自发、自愿、主动参与,宣传工作尤为重要。

发挥自媒体优势。为宣传红十字事业,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于2015年创建微信公众号,推广急救知识、分享培训经验、宣传救人事迹。公众号先后报道了程菲、杜玉科等40余名救护员抢救伤者的先进事迹和城市文明,树立了樊晓凡、程菲等“中国好人”“成华榜样”“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”等一批标杆。目前,该公众号已成为排名行业前列的自媒体,成为宣传成都城市文明的主阵地。

用技能大赛传播红十字精神。为深入推广急救培训在社区农村落地,引导群众参加急救培训。2015年,市红十字会在全市范围内首次开展红十字急救大赛,经过五年耕耘,现已发展为与市总工会、市人社局联合举办的百万职工技能大赛,红十字救护培训的社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。

服务创新

急救培训是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,在社区治理、城市文明、赛事保障等领域要有所作为。

支持师资参与社区治理和发展。鼓励和支持师资队伍扎根社区,利用社区资金、资源发展红十字事业。先后推动托爱团队、青春护航、雷风团队在基层成长壮大,有的团队一年在50余个社区开展千场培训,收效良好。特别是疫情期间,多个团队志愿者参与社区疫情防控,涌现出很多先进事迹,受到社区居民点赞。

组织志愿者参与赛事辅助保障活动。为进一步发挥急救员参与志愿服务的作用,市红十字会协调各方资源,组织志愿者参与成都会展

中心大型会展、成都马拉松、都江堰马拉松等赛事保障服务,让救护员发挥价值,更有获得感。

“医务社工+红十字义工”服务新模式。新都区红十字会结合医患矛盾的现象,主动作为,创新“医务社工+红十字义工”新模式,缓解医患矛盾、链接社会资源,输出红十字志愿者、缓解患者压力。目前,已有四个红十字志愿组织在五家医院提供服务。

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氛围。响应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战略,鼓励和支持师资队伍扎根社区发展,公平竞争社区资源和社会资源,用技术服务社区发展和治理。目前,已有多个师资队伍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40余个,在社区开展相关服务。

效能创新

创新就是要提升效能,通过模式创新、措施创新、服务创新,压缩成本,方便参训,提升培训数质量。要通过创新,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“药引子”作用,引导汇集社会资源,推动事业的持续发展。

“一键呼救”构建社区急救响应系统。青白江区红十字会在白马村实施“党建+院落+治理”社区治理模式基础上,及时创新理念,利用现有驿站和院落,培训该村管理人员,并投放10个应急响应装置和急救包,通过物联网技术构建呼救与响应,由红十字救护员和驿站急救包共同构建急救单元,最终构建白马村社区急救响应系统。

红十字会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,群众工作是红十字事业的基础,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,只有不断推进改革创新,始终聚焦“为了谁、围绕谁、服务谁”的问题,充分适应新时代,运用新技术,敢为天下先,才能为红十字事业发展带来不竭动力。

(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主任)



彰显“红船精神”的时代意义

■ 肖纯柏

15年前,习近平同志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署名文章,首次提出并阐释了“红船精神”,阐述了“红船精神”是党的先进性之源和革命精神之源。2017年10月3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湖革命纪念馆深情地指出:“上海党的一大会址、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。”

2020年,承载民族复兴梦想的时间节点。站在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交汇点,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,我们尤为需要弘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——“红船精神”。

“红船精神”体现了中共领航、依水行舟的中流砥柱形象,激励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,维护领导核心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。近代以来,中国有列强瓜分,内部一盘散沙,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界定为“群众党”,而且在行动上成为“先锋队”,开启了领导干部大规模深度联系群众之先河,实现了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的完美结合。正是中国共产党挽救狂澜于既倒,“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,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,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”。这是“红船精神”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的本质所在,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图案“镰刀+锤头”的源头所在。

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,现代化孕育着稳定,但现代化的过程蕴藏社会风险,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保障社会平衡。正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,离开党的领导,民族复兴只能是空想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,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,这一角色定位要求我们深刻把握党的领导的本质内涵和“最大优势”的发挥途径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。这一重要论述启发我们,要善于通过民主集中制把人民意志凝聚为党的意志,并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,在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实现党的领导。

“红船精神”展现了我们党坚定航向、风雨同舟的自信豪迈形象,激励我们勇立潮头与顺应潮流相统一,走适合自己并造福人类的

(光明日报)

博爱时评

溺水防范行动必须下沉到农村

■ 蒋璟璟

近日,重庆8名小学生不幸溺水。据媒体报道,出事时,这8名来自潼南区米心镇的小学生相约到镇上河坝一处宽阔水域玩耍,其间1人不慎失足落水,旁边7人前去营救,最终一并落水。

8名小学生同时落水殒命,这无疑足近年来最为严重的溺水事故之一了。悲剧总是猝不及防,悲剧每每往复循环。应该说,每一起孩童溺水身亡惨案,都有各自特殊的前因后果。但其中暴露出来的那些高度一致的致命失误,无疑更加令人触目惊心。

梳理儿童溺水事故,某些共性的规律,强烈而刺痛。首先,其发难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即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

及“留守儿童”等等因素,都从根本上注定了防止孩童溺水知易行难。

关于儿童溺水事件,敏感时段、高发地、高危人群都显而易见。理论上,这将给有针对性的高效预防提供便利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每年类似悲剧仍会重演。这一方面表明,我们的安全巡查、生命教育、风险提示、技能训练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;另一方面,也指向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,如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,如监护人的精力与看护教养子女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,再如孩子们旺盛的精力、多数的时间与乡村生活客观上的单调无聊之间的矛盾。

风险系数最高的地方,恰恰是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地方,这是儿童溺水的时空背景,多是暑假前后,村镇附近的开放水域;再者,溺水儿童多是“两三结伴,三五成群”……换言之,当一群农村孩子成群结伴去河边玩耍、去野河游泳,出事概率必将陡增。乡村场景下,大人忙于生计,习惯性的放养式育儿以